

“我忠于 中国人民”

——1950年代钱学森
在美听证会全记录

张现民
编译



直击70年前的五次听证会

听证会档案的首次公开
听证过程的全景式呈现

五年归国路
十年两弹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年上海市重点图书

“我忠于中国人民”

——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

张现民 编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钱学森在美国被迫参加的五次听证会的全记录,根据公开披露的档案资料整理并翻译成中文,是听证会全记录中文版本的首次出版。钱学森听证会是钱学森回国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钱学森五年归国路中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钱学森在听证会上掷地有声的回答是钱学森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本书为深入开展钱学森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留学教育史和20世纪国际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同时也为新时代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科技工作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素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忠于中国人民”: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张现民编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11

ISBN 978-7-313-27551-6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钱学森(1911-2009) —生平事迹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97637号

“我忠于中国人民”

——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

WO ZHONGYU ZHONGGUO RENMIN

——1950 NIANDAI QIAN XUESEN ZAI MEI TINGZHENGHUI QUANJILU

编 译:张现民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印 制: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283千字

版 次:2022年1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7551-6

定 价:8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0.5

印 次: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7910000



1950年11月,钱学森参加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在洛杉矶召开的听证会。

目录

导言 /001

1950年9月20日在特米诺岛上举行的非正式听证会 /005

1950年11月15、16日在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召开的听证会 /027

1951年2月15、16日在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召开的听证会 /160

1951年4月11日在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召开的听证会 /225

1951年4月16日在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召开的听证会 /251

结语 /299

附录一 钱学森回国年表 /304

附录二 人名译名对照表 /315

后记 /320

导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时代。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骄人成就为社会主义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和赞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欧亚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力量逐渐增强。尽管《雅尔塔协定》明确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但美苏之间的合作并未长久延续，而是很快走上了相互猜忌和对抗的冷战道路。接下来一系列危机加重了这种紧张和不安，结果造成美国“恐赤症”的加剧，“恐赤症”笼罩着美国社会。针对钱学森是不是美国共产党员以及钱学森对美国的“忠诚”，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调查对象包括钱学森工作单位的同事、朋友、领导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还包括钱学森的房东等。

从前期的调查看，基本上没有人怀疑过钱学森的“忠诚”以及当时他对政治生活的淡泊。但钱学森与一名共产党员温鲍姆的友好和亲密关系得到了确认，特别是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材料中，有一份专门从事安全调查的政府机关档案使调查人员疑虑重重：钱学森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使用党名“约翰·M. 德克尔”，定期参加在帕萨迪纳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惧”时代，美国政府对他们所怀疑的“共产党分子”“亲共产党人员”以及“有共产党思想倾向的人员”所掌握的任何证据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他们认为，钱学森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并且推荐温鲍姆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这样，灾

难就落在钱学森头上。

1950年5月18日,美国海、陆、空三军人事会议召开,专门研究钱学森案件问题。会议首先就钱学森是否应该被停职展开讨论,参会人员审阅了他们获得的记录材料以及有关信息,最终认为,如果将钱学森从加州理工学院停职,证据不足,事实也不明确,不宜做出停职的决定。随后他们开始研究钱学森在国家合同和有关备忘录的名义下进行的涉密和航空研究工作。他们在研究了有关资料后,全体与会人员一致决定,有理由相信,钱学森从事的涉密研究和航空研究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十分不利。他们认为:①钱学森曾经是司法部所认定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②钱学森与共产党员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持同情态度。最后,全体会议决定,就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内部、秘密、机密和绝密)研究以及航空研究而致函加州理工学院。6月6日,三军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通知,并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当天,联邦调查局委派人员前往加州理工学院造访钱学森,主要询问钱学森参加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以及党员身份问题,虽然钱学森一再否认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否认曾经使用了约翰·M. 德克尔的别名,最后还重申,的确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出现在1939年党员登记簿上的。但钱学森也承认,这次联邦调查局的到访使他隐约感觉到“怀疑的魔掌正在投向我”。时隔十天,钱学森正式收到禁止他从事涉密研究的通知。当天下午,钱学森就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辞呈。加州理工学院为了挽留钱学森,希望通过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试图保留钱学森的涉密研究许可证。然而,钱学森则积极地为回国做准备,预订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事宜。

为了光明磊落地离开美国,1955年8月21日,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一方面参加加州理工学院协助联络拟于23日召开的申诉听证会,另一方面拜访昔日朋友金贝尔。22日上午,钱学森前往美国五角大楼拜访金贝尔。金贝尔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与钱学森早就相识。当金贝尔从钱学森那里得知他从事涉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以及准备回国时,金贝尔非常惊讶。金贝尔不仅完全了解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而且了解钱学森在军

事上的分量。金贝尔最为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为美国的敌对政权服务。金贝尔为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律师，名叫波特。当天下午，钱学森与波特进行了会面。律师在了解了情况后说，为了在这次听证会上进行有效的辩护，达到理想目的，他需要一些时间做进一步的准备，如果在23日举行听证会，时间会过于紧张，因此建议听证会延期举行。他对钱学森说，你最好在明天上午再去金贝尔处，告诉他希望无限期推迟听证。8月23日上午，钱学森再次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把同波特会见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金贝尔同意帮助协调推迟听证会。在金贝尔的协调下，司法部同意将听证会延期举行。钱学森希望美国当局撤销对他的怀疑，然后正大光明地离开美国。带着这样的期待，他便搭乘重返洛杉矶的航班。就在钱学森离开金贝尔办公室后，这位海军部副部长立即拿起电话，给司法部打电话，告诉他们，以钱学森所具备的学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

8月23日晚上，钱学森刚刚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移民归化局的一名调查人员早就在那里等候他了。钱学森一步出机舱，那位调查人员就向他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司法部签署的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第二天，地方法院还签发了扣押令，查封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钱学森的监视。9月6日下午，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人员叩开了钱学森的家门，向其出示了拘禁令，并将他遣送到离洛杉矶数十里远的特米诺岛上。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以及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四处努力，积极援救钱学森。美国司法部及军方有关部门最后同意在囚禁钱学森的特米诺岛上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听证会。非正式听证会上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听证会上的言辞不作为指控钱学森的证据，而只是让有关方面和各有关机构以及参加会议的人员了解案情细节等情况。

正是上述这次非正式听证会，再加上加州理工院校方以及司法部门有关人员的积极争取和努力，钱学森于9月23日以15000美元的高额保释金被保释（但长期被监视）。

虽然钱学森从特米诺岛上被保释出狱，但钱学森案件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根据美国司法部意见，他们要对钱学森驱逐案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以拿出对钱学森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置意见。随后，美国司法部召开了四次正式听证会。

针对驱逐钱学森出境问题而召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四次正式听证会，就环节展开的过程来看，真可谓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步步推进。检察官首先就钱学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盘问，钱学森本人出庭应答。随着听证会的推进以及讯问情节的徐徐展开，听证官依次传唤有关证人出庭，其间还让钱学森数次出庭，回答质问。从听证内容来看，针对检察官提出的刁难问题以及变着法儿设陷挖坑，钱学森表现得非常机智和勇敢。针对听证会上透露出来的咄咄逼人气势，钱学森也毫不示弱。

本书通过这些一问一答，甚至唇枪舌剑的对话，原汁原味地再现了70多年前钱学森在美听证会上的场景，真真切切地将读者拉回到那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岁月。面对美国检察官的百般刁难和威胁诱迫，钱学森用智慧和力量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什么是中国人的赤胆忠心！

1950年9月20日在特米诺岛上举行的 非正式听证会

地 点：加利福尼亚州特米诺岛

时 间：1950年9月20日

出席人员：^①

钱学森的代理人：格兰特·B. 库柏(Grant B. Cooper)

美国助理检察官：马克斯·F. 多伊兹(Max F. Duetz)

陆军装备司令部人员：威廉·H. 邓恩(William H. Dunn)

陆军装备部洛杉矶办事处代表：莱曼·P. 戴维森少校(Maj. Lyman P. Davison)

美国海军地区情报(洛杉矶)办公室代表：乔治·R. 波特(George R. Porter)

美国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代表：罗伊·M. 戈林(Roy M. Gorin)

美国海关洛杉矶代表：欧内斯特·S. 格莱泽(Ernest S. Glazer)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贾斯廷·T. 贝内特(Justin T. Bennett)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艾伯特·德尔·古尔丘(Albert Del Guercio)

库柏：

这次会议是我向诸位和检察官托林先生(Mr. Tolin)建议后召开的，

^① 原档案未把钱学森列入出席人员。

其目的是审理并查明事实。我已经知会钱学森他所具有的权利,对此他完全理解。他也理解他说的话可能在任何程序中成为反驳他的依据。尽管如此,钱学森希望答复参加会议的诸位先生可能会询问的、涉及这个案件的所有问题。我还告诫他说假话的严重后果:他这里说的谎话可能在任何程序中成为反驳他的依据。他也理解在法庭上说谎可能被指控为伪证罪。我只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将提问的问题及回答保留一个副本。我试图让所有政府机构明白他们所不知道的整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他已经知晓他的权利并愿意在此做出上述声明。

古尔丘:

可以理解,毫无例外,这个程序对移民归化局以后要召开的其他诉讼或程序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程序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我们认为,从《移民法》来看,要断定钱博士所受指控是否属实,现在既不是合适的时候,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地点。

库柏:

我已争取能够保释钱学森,保释与否由美国检察官裁决。为向司法部部长和美国检察官提供裁决依据,我希望诸位知晓我所了解的关于此事的真相,诸位肯定愿意,也一定会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多伊兹:

我重申一下,就这个案件而言,我们对大家所提问题及其回答都进行了速记,但大家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非正式的诉讼,钱学森自愿回答有关政府机构向他提出的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个程序本身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仅仅是一场非正式的调查,政府同意为库柏准备一份副本。

库柏对钱学森:

问:钱学森博士,你出生在中国吗?

答:是的,1909年^①。

^① 在钱学森留美护照以及美国档案中记载的钱学森出生年都是1909年出生。针对这一说法,钱学森回国后在其入党申请书中解释:“我因不会把生日从旧历换算成公历,才说我生于1909年9月2日,这是错误。但即(既)登入出国文件,在美时就一直用这生日日子。”

问：你现在是中国公民？

答：是的。

问：你是1935年来到美国的？

答：是的。

问：是获得奖学金资助才来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

答：在美国学习两年，有可能延长一年。我来美国学习并不是特别为了进麻省理工学院，我可以选择其他学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问：你是持学生临时签证来美国的？

答：是持学生签证来美国的。

问：你持学生签证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答：直到1947年4月，那时我离开了美国，后来持永久签证从加拿大重新回到纽约。1947年，我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在中国待了三个月时间，即7月、8月、9月。

问：你看望了你的父亲？

答：是的。我回中国还结婚了，然后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入境，重新回到美国的。

问：在1947年你回到美国前或其他时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具体地讲，你是加州理工学院共产党122小组或其他以推翻美国政府作为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吗？

答：我不是以上所说任何组织的成员。

问：从1937年以来，你认识温鲍姆(Weinbaum)博士吗？

答：是的，我认识温鲍姆。我还认识马林纳(Malina)和杜布诺夫(Dubinoff)^①——我认识很多人，但我只想提及可能和本案相关的名字。

问：你是1937年或1938年来加州理工学院的？

答：我是1936年秋天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

问：你的职位是什么？

^① 原文如此，后几次听证会出现此人时为Dubnoff，为了全书译文统一，皆译为杜布诺夫。

答：1936年到1939年，我是一名学生。

问：你的专业是什么？

答：我主攻空气动力学。

问：那时候，温鲍姆也是一名学生？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是什么职位？

答：我认为，他的职位是研究人员。杜布诺夫是研究人员。马林纳更像是我的同龄人，是学生。

问：你经常去温鲍姆的家吗？

答：应该说，我和马林纳更熟。事实上，这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领域有共同兴趣。通过马林纳，我被引荐给他们。马林纳是我们系的，其他人不是我们系的。温鲍姆是化学系的，杜布诺夫是生物系的。马林纳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

问：你经常登门拜访他们吗？

答：是的。我认识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的。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在哪里认识他们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对音乐以及对中国和东方的事物都有兴趣。

问：那时，在你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所处境遇的同情，是吗？

答：是的，他们的确这样。这也是他们对我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你们也能回想起，那时中日战争刚开始，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听到人们对中国的同情。

问：你拜访温鲍姆，有时候是应邀而去，有时候仅仅是非正式的顺便访问，是吗？

答：是的，因为我和他们非常熟悉，经常在晚上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顺便拜访他们。

问：有时候，他们独自在家？

答：有时独自在家，有时是一群人。

问：是否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马林纳和杜布诺夫都在温鲍姆家中？

答：是的，我提到的这三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问：你在同他们会见或者在拜访他们时，是一星期一次的定期访问，还是不定时的访问？

答：差不多一星期一次。

问：具体是哪一天晚上？

答：并不是非常固定，但通常是在晚上，并且经常是星期三晚上，因为那一天我有时间，没有学习安排。我通常是保持固定的工作时间。

问：你同他们的友好关系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很难说从什么时间开始，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想那一定是在1938年以后。

问：温鲍姆是什么时候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其他地方的？

答：我也说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但是我确定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那是1941年之后，他在校外得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企业中工作，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之后他就到东部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的？

答：我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较晚，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应该是在1943年之后。

问：在你积极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期间，你还见过这些人吗？

答：就马林纳而言，甚至在我从事这一工作之前，我也不经常见到他，因为他比我更早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而我从事的是非保密性的工作，自然就不经常见到他。

问：在你拜访他们时，你知道、相信或者认为这些是共产党的会议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共产党员。

问：这些拜访是不是一群人进行的非正式会面？

答：在我看来，它们是这样的。

问：现在你回过头来，用目前怀疑的眼光看，你会不会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

答：现在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目前我从报纸上获得的一些信息，我

的确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

问：我想，尤其是当你获悉了对温鲍姆的审讯，是吧？

答：是的。

问：你现在是否认识到，他们在中日交恶时发表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谈话也许能表现其共产主义立场？

答：从我现在获得的一些信息看，我可以说那是很有可能的——当然。

问：你曾经有意加入那个组织？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知道，你的名字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出现在他们的党员名单上？

答：不知道。

问：你曾经有任何共产党组织的党员证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你在上面签过名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拥有过这个证件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过那个签着你名字的证件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加入共产党组织或者持有一份(党内)假名的证件吗？

答：没有。

问：我们把谈话时间拉到当前——你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啦？

答：他 69 岁。

问：数年前，你父亲曾经有个大手术？

答：不，是去年冬天他进行过胃部手术。

问：你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吗？

答：是的，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并且医生通知说，手术还没有完成，他

希望在今年冬天进行第二次手术。

问：你父亲的全名是什么？

答：钱均夫，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

问：你还记得给你父亲做手术的那位医生的名字吗？

答：我认为蒋英女士知道，因为是她回的信。我忘记医生的名字了。

问：你收到过你父亲希望你回国的信件了吗？

答：是的，收到了。

问：当你最后一次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你填写过日常的安全许可申请吗？你最后一次填写安全许可是什么时候？

答：最后一次应该是1949年9月或10月。

问：在那之前，你签署过类似的申请并收到许可了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在从事与安全有关的工作？

答：是的。

问：你第一次知道你受到怀疑是什么时候？

答：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可能在1950年5月底或者在6月初。

问：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注意？

答：有一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会见我。

问：你当时向他们做陈述了吗？

答：他们调查的目的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美国共产党员。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如同我今天回答你们的一样。

问：你第一次将被怀疑的情况报告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官员，那是什么时候？

答：让我这么说吧。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我很快将退出涉密工作。我记得在那之后不久，我就与林德瓦尔(Lindvall)博士谈过。他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顶头上司，是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

问：你告诉林德瓦尔博士，你可能不能继续从事涉密工作？

答：是的。

问：鉴于你已收到父亲的来信，你将来不能继续从事涉密工作的消息对你最终决定返回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那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已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老人家早希望我回国。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我很早就很清楚，但当时我专心于工作。当你专心于工作时，你很少关注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从事涉密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使我开始思考个人问题：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我更加不安，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目前执政的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公开的敌意。换句话说，大陆实际上被控制在共产党政权之下。

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争取获准回中国的？

答：我想，确切地说，我询问相关事项后预订了“威尔逊总统号”，那是6月中旬。

问：你确实购买了船票，还是同他们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沟通？

答：我到他们办公室，然后预订了船票。他们告诉我，要想离开美国需要获得过港签证。

问：那是1950年6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同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人员商谈过返回中国的决定了吗？

答：没有！我首先告诉的是林德瓦尔博士，然后告诉华森(Watson)教授，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教工委员会主席。教员辞职要报告给他，因此我必须告诉他。几个星期后我才告诉杜布里奇(DuBridg)院长，因为那时他没有在学校。6月中旬，我的许可证被吊销。

问：是什么时间通知你“许可证被吊销”的？

答：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大约是在6月中旬。

问：这确实更加坚定了您回国的决心？

答：当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华森博士。加州理工学院对我回国深表不安，他们希望我不要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有很多事促使我回到中国，父亲即将进行的手术以及中美之间可能发生